

# 基于场所营造的社区规划:北京“新清河实验”的实践探索\*

Community Planning Based on Placemaking: Practice Exploration in "New Qinghe Experiment", Beijing

刘佳燕 LIU Jiayan

**摘要** 伴随社区规划的迅速发展,探索在地化路径成为重要关注点。通过梳理中西方社区规划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呈现出从“基于空间”到“基于场所”的演进特征,其源自对社区作为一种地方性场所的复杂内涵的认知,进而辨析中国传统语境和实践中的社区概念,揭示“地方场所”和“地方治理”是关键理念。基于对场所和场所营造相关概念和特征的辨析,从社区规划的角度,提出社区作为场所的多维价值属性,包括地域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综合性的场所营造得以完整实现。结合北京“新清河实验”中的社区规划实践,探讨在地化的场所营造策略,提出主要实施路径,包括提升宜居性、增进场所感、开展跨域协作和推动社区参与等方面。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lanning, exploring the localization pat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lanning in the West and China, and summarizes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 from "space-based" to "place-based", which derives from the cognition of the complex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as a local place. Then, it differentiate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ontext and practice, and reveals that "local place" and "local governance" are the key concep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ative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and place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planning, it puts forward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s of community as a place, including territorial community, life community and governance community, which may be completely realized through comprehensive placemaking. Furthermore, combining with the community planning practice in the "New Qinghe Experiment" in Beijing, it discusses the localized placemaking strategies, and summarizes four main asp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including improving livability, promoting a sense of place, carrying out cross-domain collaboration, as well as facilita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gether with detailed examples in Qinghe practice.

**关键词** 场所;场所营造;社区规划;社区参与;新清河实验

**Key words** place; placemaking; community plann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New Qinghe Experiment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1) 05-0001-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 20210501

## 作者简介

刘佳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 liujiayan@tsinghua.edu.cn

社区日益成为当代城市研究和规划的重要关注点。其内涵中天然蕴含的社会性和空间性相交织的复杂特质,上百年来吸引着大批研究者和规划师不断探索有关理想社区的标准和要素,以及实现这些理念的规划路径<sup>[1-2]</sup>。近年来,社区规划在中国多个城市迅速兴起,人们日益认识到,真正理想社区的实现并非简单依赖于标准化的模型或范式,而需要深耕

基层,挖掘地方特色、探索在地化路径和推动社区参与。这也成为当前从理论到实践的重点问题<sup>[3]</sup>。

本文在梳理社区规划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基于对场所理论和我国社区特色化概念的解读,辨析社区作为场所的多维价值特征,进而结合北京“新清河实验”的实践,探讨面向在地化场所营造的社区规划路径。

\*基金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政策工具和案例评估的城镇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政策体系研究”(编号2020-R-010),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编号UDC202002111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宏观视角下北京中心城区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研究”(编号18SRC014)资助。

## 1 社区规划的演进和中国社区概念的特殊性

### 1.1 社区规划的演进历程

社区最初成为规划的一个主题,可见于早期的乌托邦式工/农业社区、花园城市和新城镇规划中,为应对当时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扩张,试图以高度理性且标准化的形态、明确的理想和功能、强大且有远见的拥护者来创造新的居住单元,但其中的生活群体却是抽象或不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兴起大规模内城更新和贫民窟改造,当时认为环境的现代化将增进社会经济福祉,但实际却带来大量不可逆转的邻里破坏,引发人文主义思潮对社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关注,由此带来了向社区发展的理念转变。规划开始更加注重地方振兴和社会服务,而不仅是物质环境建设。国家仍普遍在社区规划中发挥中心作用,伴以权力向地方下放以及更多市场化的运行机制。社区发展公司等社区组织形式和倡导式规划等基于社区的规划实践激增,掀起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浪潮,主要围绕获得公共物品、激进民主和城市权利展开。日益多样化的社区发展和规划形式,是对当代社会经济不平等在地方邻里加剧的一种回应,也为地方力量参与社会空间变化提供了更多可能。

当代中国社区规划的发展也基本呈现出类似的转型特征,从侧重物质环境、精英主导的蓝图式规划,转向推动更加综合的、关注场所和人群的独特性、政府主导与社区参与相结合的社区发展,“以人为本”和“以场所为本”成为聚焦点。具体体现在:反思抽象形式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先验规划模型,倡导从日常生活出发,尊重地方的多样性和需求分化;反思过度聚焦空间规划,将社会人文纳入规划实践;反思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市场利润,强调社会福祉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反思封闭、一言堂的决策形式,倡导开放包容与公众参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社会正义的更坚定承诺。

Smith等<sup>[4]249</sup>总结全球范围的社区规划体现为“关于社区的规划”“为社区的规划”“与

社区的规划”和“由社区的规划”4种主要形式<sup>①</sup>,并呈现出由前往后的演进顺序。这折射出不断变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逐步推进的社区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当前中国规划和政策的“社区转向”特征。但具体而言,上述4种形式中的“社区”分别对应不同的主体和范畴,简单摘取其地域性或社会性指代而冠以笼统称谓,可能导致社区规划的概念混乱和片面操作。

总结可见,中西方社区规划的演进普遍呈现出从“基于空间”(space-based)到“基于场所”(place-based)的特征。这源自对社区作为一种地方性场所的复杂内涵的认知。

### 1.2 中国社区概念的特殊性

关于社区概念存在多元化的解读,关键要素包含地理区域、社会互动和公共联系等<sup>[5]</sup>。空间视角下,社区指特定地域范围内的物质环境;社会视角下,是基于共同兴趣、文化或利益连结的共同体;治理视角下,是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单元。社区内涵的复杂性,加之现实中不同视角下社区所对应的地域范围和主体的差异性,成为社区规划中不可忽视的前置问题。

在中国,社区概念自诞生起就呈现出独特的在地化诠释和实践演绎。一是强调作为地方性场所。《说文解字》中“社”释为“地主也”,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日子和祭礼,“区”字更直接包含“地域”之意,体现出自古紧密的人地关系。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早期著名社会学家很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学派”关注邻里特征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在社区研究中强调基于地方的实证调查。二是与地方治理紧密结合。从汉唐的里坊制、宋代的乡治乡约、明后的保甲制,到建国后的单位制与农村公社、街居制,至现在的社区制,一直以来社区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动员、环境决定论理想以及地方互助自治相结合的落脚点<sup>[6-7]</sup>。Rowe等<sup>[8]</sup>认为,中国的社区概念不同于Tönnies的定义,而更接近Suttles提出的,即基于特意和理性的,有意愿的或社会性的建构。由此引申出中国社区规划的特殊性——不仅指领域的划

分、设计和建设,还意指国家与地方积极努力地规划理想的和可复制的示范社区<sup>[4]253</sup>。

可见,“场所”和“营造”两个关键词深植于中国的社区理念中,前者强调空间性和社会性的整合,后者突出国家与地方力量互动下的创造与持续运营。

## 2 场所价值和场所营造

### 2.1 关于场所

场所(place)一词最早由地理学家Wright(1947)提出,被定义为承载主观性的区域。相比于空间(space)更多地指向不确定的、与个体没有社会联系的地点,场所是一种具有特定位置的固定空间,具有自己的特征、身份和价值<sup>[9-11]</sup>。在社会文化的视角下,它还是互动的社会空间,为社会关系赋予涵义<sup>[12]</sup>。

Cresswell<sup>[13]</sup>提出场所概念包含3个层次:(1)描述取向,强调区域的独特性,体现为对所见世界表面的关注;(2)社会建构取向,如Harvey提出场所是资本、权利、排斥等社会建构的产物,Pred主张强调改变和过程的场所概念,它从未“完成”,总是处于“流变”中;(3)现象学取向,如Tuan和Relph认为场所强调主体性和经验,而非冷漠的空间科学逻辑。

最常与场所相关联的,是家和社区的概念。一方面,社区作为场所,承载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当下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充满了经验和意义,同时让人们对自身和地方产生认同;另一方面,社区场所又不断被记忆、想象和认同共同塑造,形成场所感、场所意象、场所认同、场所依恋、场所记忆和归属感等一系列子概念<sup>[14-16]</sup>。

场所感通常在社区等日常环境中得以建构。从象征意义而言,其意味个体为居住地赋予的主观意义和重要性;从情感意义而言,是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从反身性而言,指围绕人的能动性组织起来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汇合<sup>[17-18]</sup>。

### 2.2 社区的场所价值

从社区规划的角度,社区作为一种场所,

注释: ①Smith等(2019)提出,“关于社区的规划”(planning of communities)指对尚不存在的空间和社会关系进行乌托邦式的设想;“为社区的规划”(planning for communities)指家长式的国家关注现有环境和人口的健康发展和可管理性;“与社区的规划”(planning with communities)指认识到国家、各行各业和各种社会集体拥有不同的权力和利益,并采取协作模式;“由社区的规划”(planning by communities)指一定程度上的社区自治和自我决策。

呈现出复合的价值属性,主要有以下3种形式。

(1) 社区作为地域共同体。来自场所作为物理空间的“邻近性”和“宜居性”的假设:地域的邻近性是福祉获取的前提,环境的宜居性是生活质量的保障。强调物质环境对于塑造良好社区的重要作用,并认为人们关于生活的主观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客观的生活质量<sup>[19]</sup>。从邻里单元到新城市主义、社区生活圈的探索,从早期宏大、抽象的关于理想居住单元的模型和准则研究,转向注重因地、因需制宜的精细化设计。

(2) 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来自场所作为生活空间的主体体验属性,强调“互动”和“认同”。社区场所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资源,面向所有年龄、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提供进入和享用的可能,并在其互动交往、情感维系和身份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sup>[20]</sup>。不同于前者假设的具备理性规模和格局的空间单元,这里的社区是动态的,由特定时间、空间下社区内的人及其与他人、与场所之间的互动形成<sup>[21]</sup>。实际中,可能存在多个由行动者认知的社区,作为人们在共享的日常实践中产生互动和情感认同的场所,它们通过不同的体验、归属或身份共存<sup>[22-23]</sup>。

(3) 社区作为治理共同体。来自场所作为社会建构的属性,强调“共享”和“参与”。社区作为国家和社会、个体间的连结桥梁,体现为国家意志、地方福祉与社会多元主体交织而成的利益网络,它既是基层管理单元,也是地方寻求共同发展的单元。

对于一个社区而言,3种价值属性可以同时并存、相互作用。例如,基于良好规划设计的在地域共同体,通过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促进邻里交往和场所认同,成为紧密团结的生活共同体,在互动互助的过程中相关主体间构建起合理高效的伙伴关系和参与机制,亦成为良序共治的治理共同体。

但大量相关社区规划实践中,往往只看到或聚焦于上述某一种价值,如单纯针对邻里空间的环境改造,或是局限于行政边界内的资源投放,导致社区的场所价值呈现并不完整,甚至制约其可持续发展。例如社区治理关系的

完善,导致社区主体意识淡漠,人们对场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低下,进而引发破坏环境甚至居民大量迁出现象,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社区。

特别在中国当前社会空间转型背景下,大规模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人口流动、身份转变和社会分化使得社区的场所价值处于迅速转变和重塑的过程中。因此,探索综合性的场所营造策略,使社区作为场所的多元价值得到完整实现并相互促进,推动社区共同体的建设,是当代社区规划的重要内容。

### 2.3 场所营造

场所营造体现为由社区驱动、规划师和专家推动的广泛的社区战略和行动,是一个持续的协作过程,通过有效的布局和设计以及良好的管理将行动转变为实践,旨在改善社区环境和生活品质,塑造公共领域,最大限度地实现场所价值<sup>[24-25]</sup>。

PPS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界定场所营造的特征是:社区驱动的,有远见的,先功能后形式,有适应能力的,包容的,专注于创建目的地,基于特定背景的,动态的,跨领域的,变革的,灵活的,协作的,社会性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反动的,设计驱动的,有一揽子或快速解决办法的,排他性的,以汽车为中心,一刀切的,静态的,纪律驱动的,一维的,依赖监管控制的,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以项目为中心的<sup>[20]</sup>。

可见,场所营造不限于针对几个公共空间或城市设计项目,而且是一种营造的理念和持续性策略,是实现并进一步提升社区场所价值的重要手段。但既有研究和实践大多集中于公共空间的设计手法。如何基于社区作为场所的整体性认知,将场所理念和系统营造策略纳入社区规划,特别结合我国社区的独特背景,亟待探索。以下将结合笔者团队在北京清河街道开展的社区规划实践进行探讨。

## 3 “新清河实验”的社区规划实践

### 3.1 地区基本情况

清河街道地处北京市海淀区北五环外,占

地9.37 km<sup>2</sup>,常住人口约1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9万人。相比北京城中众多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和产业街区,这是一个看似寻常而又极富普遍性的邻里型社会空间。

总结清河地区的社会空间主要特点如下:

(1) 展现非典型历史地区面临的发展与文化遗产的冲突。清河地区拥有2000年历史文化积淀,曾是京北地区集陆、水、铁、航路于一地的交通、军事和商业要地。目前零星尚存汉代古城墙、明代广济桥、京张铁路清河火车站等遗址,而大量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载体几近消亡,包括建于晚清的陆军第一中学堂、北京最早的毛纺厂(清河薄利制呢厂)和后来盛极一时的三大毛纺厂,建于1920年的航空工厂和飞机场等。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部分已远离当代生活。

(2) 记录北京以“空间城镇化”为典型表征的快速城镇化历程。21世纪以来,清河地区从传统乡村集镇迅速转型为现代化城市地区,京藏、京新高速公路和五环路带来便捷的交通区位,其所在的海淀区全部被划入中关村科学城,吸引大批中高端房地产项目和高新技术企业入住,高层商务楼宇、新型购物中心拔地而起。

(3) 集聚类型多样、混合交错、高度分异的居住空间。居住是清河地区最主要的用地类型,这里有单位大院、别墅区、商品房小区、部队大院、政策性保障住房、拆迁安置房、城中村等10余种居住邻里类型,空间形态和环境品质分异显著,拥有高度异质化的生活群体(见图1)。

### 3.2 项目概况和定位

2014年至今,清华大学社会学、城乡规划等专业的师生在清河地区开展了面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清河实验”<sup>②</sup>。社区规划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致力于以跨学科团队力量,通过空间规划与社区治理的整合路径,提升社区场所品质,促进公众参与,激发社区活力,实现社区的全面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广泛的社会空间调研,总结清河地

注释: ②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在清河镇开展乡村建设的社会学实验,从农业生产、乡村医疗和教育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建设,史称“清河实验”,后因战争原因中止。为以示区别,同时体现对当年扎根地方开展在地实验的继承,将当前的工作称为“新清河实验”。



区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空间分异显著,邻里关系趋向松散,社区活力衰退和自组织能力有限;区域交通不畅,停车混乱,慢行交通环境差;公共空间严重不足,环境品质低下,老旧小区活动场地短缺且缺乏有效维护;文体休闲等服务设施短缺,服务品质偏低,地方特色逐渐消亡等。究其根本,核心问题体现为公共领域发展滞后带来场所衰退: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公共空间品质低下。传统单位主体退出,市场主体画地为牢,加上基层规划建设管理的滞后,导致服务设施配套不足和公共空间品质低下,难以满足人们不断提升的生活需求,更不用说日益涌入的中青年和新兴产业就业人群。另一方面是社会层面的公共领域发展滞后。“人的城镇化”滞后于“空间的城镇化”,市民意识缺乏,邻里关系淡漠,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两者相互影响,导致社区场所在社会与空间层面的双重衰退<sup>[26]</sup>。

由此,确定清河社区规划的主要路径包括:(1)以社区为纽带,强化社会与个体、家庭之间的紧密连结;(2)从公共领域入手,聚焦物质性公共空间和社会性公共事务,激发市民意识;(3)依托参与式规划,通过场所营造与社区赋能,增进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旨在营造幸福、包容,以及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共同体(见图2)。

### 3.3 第一阶段:试点社区的实践探索

2015—2017年,选取试点社区开展社区规划,探索通过专业支持、社区参与的方式,围绕公共空间,形成公共议题,提升社区场所品质和归属感,同时激发基层活力。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 3.3.1 优化基层治理架构,聚焦社区民生事务

调研发现,社区居委会作为自治组织的作用有限,居民对社区事务有参与意愿,却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sup>[27][26]</sup>。因此,前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搭建基层协商议事平台,包括协助制定议事委员制度、议事公约,举行联席会议。由此,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值得一提的是,社区的重要议题中大部分和公共空间有关,既暴露出当地

场所品质亟待提升的窘迫现状,也反映出公共空间吸引社区参与的重要磁石效应和外溢效应。

#### 3.3.2 挖掘培育社区资产,强化社区赋能

基于“资产为本”的理念,团队全面调研

空间、社会、产业、生态等地方资源,绘制清河地区特色地图和社区资产地图,尤其注重社区社会资本的挖掘和培育。如面向街道、居委会和居民开展系列讲座和互动工作坊,普及参与



图1 清河街道社区类型分布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types in Qinghe Jiedao

资料来源:刘佳燕、沈毓颖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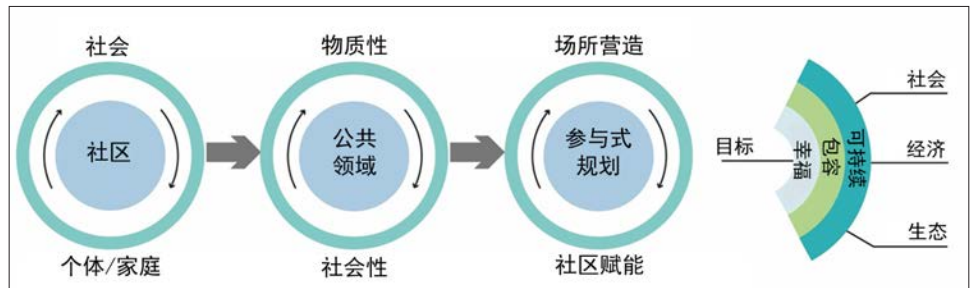


图2 清河社区规划的目标和路径  
Fig.2 Objects and path of Qinghe Community planning

资料来源:刘佳燕、沈毓颖绘制。





图3 社区参与微空间改造  
Fig.3 Micro space renovation wi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理念和方法,形成共建家园的共识;举办“社区LOGO征集”“建筑师体验工作坊”等活动,选拔社区能人,在协同设计中提升居民审美意识、设计能力与合作精神;组建社区学堂,促进邻里互助学习,推动兴趣团队的公益转向,培育在地社会组织。

### 3.3.3 社区参与微空间改造,推动综合品质提升

针对居民诉求最集中的公共空间品质提升需求,通过参与式社区规划,开展一系列微空间改造行动:①引入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与居民共同创作和开展住宅楼立面美化,将生活场景和生动故事留在身边;②通过居民访谈、参与式设计工作坊、联席会议、公众咨询等持续性的公众参与环节,与社区共同设计,将荒弃绿地改造成休闲活动广场,引导居民拟定文明公约,并组建志愿者维护队伍;③采用“微公益创投+微空间美化+微治理”方式,围绕楼门、楼道的空间美化,街道、辖区机构和物业公司提供资金、物料支持,团队负责活动组织和技术支持,发动居民自主提案、设计和参与实施与后期维护;④借助问卷、座谈会、扎针地图

等线上线下调研,广泛征集居民和工作群体关于公共空间的使用意见和改进提案,联合相关部门、街道和社区、辖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研讨解决(见图3)。

## 3.4 第二阶段:街道层面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推广

第一阶段的工作在试点社区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探索出一条通过参与式规划提升社区场所品质、增进邻里互动与归属感的有效路径,也给其他社区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效应<sup>[27][28]</sup>。但同时也暴露出局限,即工作主要集中在试点社区内部,侧重于楼院和小区层级。尽管存在团队人力有限的客观原因,以及从微单元入手的治理逻辑考量,但社区规划作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投放引导,背后不可忽视的是公共性和公正性问题。此外,团队调研发现,从提升地域福祉和增进社会联结的角度,小区围墙之外、街区层面的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的作用更为显著。由此给后续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一是如何从街区统筹的角度让规划效益辐射至更多的社区;二是如何吸引和动员更广泛的专业性和

社会性力量参与。这意味着社区规划中的场所营造不仅涉及技术策略,还需反思和打破既有行政、地域、制度等体系的局限,进行战略创新。

自2018年至今,新阶段的工作重点聚焦在街道层面的制度创新,从街区统筹的角度推动社区规划在更多社区的推广和规范化。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 3.4.1 编制街区更新规划,完善体检评估机制

针对基层建设项目小、碎、散的问题,编制“清河街区更新规划”,基于社会和空间调查、意见征询和协商会议,形成清河街道全域更新发展总体思路,统领各社区规划建设,以“一张蓝图+定期体检+动态更新的项目库+行动方案”保障规划落地实施。

针对基层社会—空间数据短缺的现状,建立社区体检指标体系,涵盖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和谐包容、创新活力等维度,基于基层政务、社区调研、街景地图、影像图、POI等线上线下数据,开展全域社区体检评估,为明确各社区特色和定位、识别短板和风险,以及规划的动态更新提供支撑。

### 3.4.2 创建社区规划师制度,培育在地跨学科团队

针对基层规划建设中的制度性约束,包括专业人才短缺、资金投入重工程轻设计、建设项目碎片化,导致难以吸引高水平的团队和成果等问题,为清河街道量身定制社区规划师制度,实现从“为工程买单”到“为智力买单”,从“按次服务”到“扎根陪伴”的转变。

采取街道搭台、机构共建、专业培力、社区协作的方式,通过公开招募和选拔,为各社区分别配备“1名设计师+1名社工+N名社区规划员”的社区规划师团队。设计师和社工来自辖区企业和社会组织,大部分也是清河地区居民,对规划自己的家园充满热情和动力;社区规划员来自有能力、有意愿的社区居民和外部志愿者,作为未来社区规划最主要的生力军。为落实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社区规划工作牵头人同时担任清河街道高校合伙人责





图4 清河街道“责任规划师—社区规划师”协作机制

Fig.4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of "principal planner - community planner" in Qinghe Jiedao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社区规划活动和成果掠影

Fig.5 Snapshots of community planning activities and outcomes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任规划师,也是社区规划师团队牵头人<sup>③</sup>。

由此形成“责任规划师—社区规划师”互动协作机制,为多方主体参与地方发展提供了多层次的协作平台:在社区层面,社区规划师扎根了解需求,开展协商共治和社区赋能,协助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并推动实施;在街道层面,责任规划师推动上位规划与地方发展的对接,统筹街区发展思路、整合内外部资源、提供技术指导,并带领社区规划师团队面向街区事务和社区重大事项协同工作(见图4)。

### 3.4.3 规范社区规划工作流程,推动特色项目落地实施

协助清河街道编制《社区规划师制度试行办法》《社区议事协商工作指南》等文件,明确社区规划师招募、职责、薪酬、考评等管理机制,规范议事协商、社区规划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明确长效工作机制。

在社区规划师团队的共同推动下,多个社区分别完成了社区资产和需求调查与评估报告以及社区发展规划与近期行动计划,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社区规划项目落地实施。如引入社会组织 and 志愿者团队,通过营造工作坊、自然教育课等活动,发动社区居民和小学师生共同设计和建造,将废弃绿地改造为社区花园,并

制定维护公约和组建维护小组;通过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对中心广场进行整体改造提升,打造成全龄友好的活力空间;结合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通过需求调研、功能策划、改造设计和后期运营策划,将既有建筑改造为社区综合体“清河生活馆”,营造集社区服务、党群活动、养老、阅览、文化展陈、便民商业、社会组织孵化、社区花园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邻里生活中心(见图5-图6)。

## 4 基于场所营造的社区规划策略

总结清河社区规划实践工作,场所营造作为重要内容,通过聚焦公共领域,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在地协作,提升场所的整体品质,增进人与人、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和认同感,优化多方主体持续营造共同家园的治理网络,从而全面提升社区作为地域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的整体场所价值。具体实施路径包括以下4个方面(见图7)。

### 4.1 提升宜居性

通过改善环境、优化设施配置和福祉供给,提升场所的宜居性,既是场所营造的基础,也是保障人们能长久安心愉悦地居住、工作和休闲的前提。

清河实践中的具体策略包括:(1)开展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调研,如现场踏勘、问卷调查、个体访谈、座谈会、工作坊、大数据分析等,以使用者需求作为场所设计和资源配置的基本出发点;(2)聚焦公共空间和公共场所,作为提升社区福祉的关键,注重街区层面的统筹协调,兼顾地域分布的公正性和面向不同社区的差异化配置;(3)关注5—10分钟、15分钟步行生活圈的两级配置,前者着眼于楼栋、院落空间和便民服务,有助于提高生活便利性,吸引社区参与和增进“粘结型”(bonding)社会资本;后者着眼于城市开放空间和公共设施,有助于提高生活品质,增进市民意识和“桥梁型”(bridging)社会资本;(4)编制街区更新规划,对服务设施、交通组织、景观风貌、产业活力、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进行资源盘整和系

注释: ③根据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海淀区每个街镇配备“1+1+N”(1名街镇规划师、1名高校合伙人、N个设计师团队)的责任规划师团队。



图6 “清河生活馆”(左上:改造前;上中:方案协商;其他:改造后)

Fig.6 "Qinghe Life Center" (upper left: before renovation; upper middle: design consultation; the rest: after renov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统规划;(5) 通过存量资源更新再利用,植入新的、更多元的功能,如改造建设全龄友好的“一站式”社区综合体,将宅间荒地改造为融自然休闲与社区教育于一体的社区花园。

#### 4.2 增进场所感

通过持续植入丰富的功能活动、人文记忆和特色认同,把空间转变为更富品质和有意义的场所,增进人与场所之间的联系,创造场所感。

具体策略包括:(1) 开展社区体检,为各社区的特色资源挖掘和特定问题识别提供支撑;(2) 营造开放、包容、多样化的公共空间,促进不同年龄、家庭、爱好、阶层人群的互动和互助,强化社会交往和归属感;(3) 以绿色空间作为增进社区协作的重要纽带,发挥其受众广、专业门槛和成本低等优势,如结合社区花园的共建,吸引不同家庭、年龄的孩子互动合作,为老年人提供发挥特长、服务社区的机会;(4) 强调全过程的社区参与,在人与人、人与场所的互动中增进了解,形成情感连结,如发动居民参与社区标识设计和空间美化,激发人们对日常生活场所的关注、期许和投入;(5) 引导社区参与空间运营维护,培育归属感,形成长效机制,如居民参与空间改造后顺势引导成立维护小组,“清河生活馆”中鼓励居民捐赠老物件、志愿担任讲解员,让民

族工业、大院文化、传统手工艺等珍贵的记忆和传承重放光彩。

#### 4.3 开展跨域协作

社区场所价值的复合性使得社区规划需要跨越不同的地域范畴,围绕差异化的目标和命题吸纳不同的主体参与和协作。

具体策略包括:(1) 面向地域共同体建设,强化街道和相关部门对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的系统供给,注重跨越行政边界的功能对接和设施共享,社区两委更多发挥需求收集和监督评估的作用。如与清河水系沿线街道共建“清河绿道联盟”,协同开展水系两岸的生态修复、交通优化、设施完善和环境提升等工作;(2) 面向生活共同体建设,构建多级公共空间网络,联动形成生活协作网络。如以绿色和分享为主题,以“口袋花园—社区花园—阳台花园”3级绿色生态网络渗透并串联街区、社区与楼栋;围绕养老、儿童教育、公共空间改造等公共议题,鼓励组建互助会、共建小组,打破家庭、楼栋和小区红线的隔阂;(3) 面向治理共同体建设,完善“楼栋—小区—社区—街道”多层级联动治理。如通过楼门美化,激活“微治理”的末梢组织;在小区层面,优化居民、业委会、物业公司与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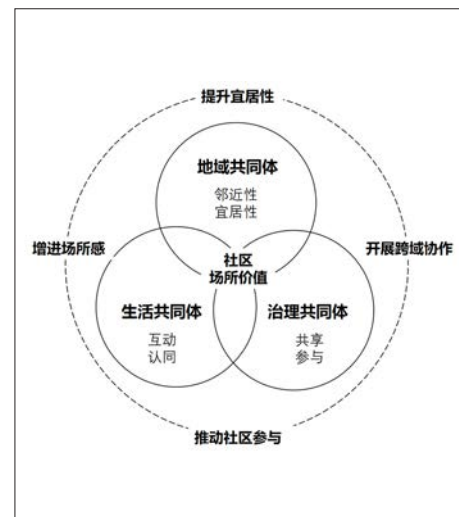


图7 面向场所营造的社区规划

Fig.7 Community planning towards placemak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之间的协作关系;在社区层面,强化社区两委与街道、辖区机构、社会组织的共商共建;在街道层面,创新社区规划师制度,依托“责任规划师—社区规划师”推进街道和社区层级的规划协作。

#### 4.4 推动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场所营造的重要动力源泉,有助于发现社区居民的需求和愿景,凝聚地方知识、创意和力量,形成应对地方需求和特色的在地性规划,培育人们对于自身和集体能力、规划行动和成果的认同感,提升社区规划的实施效果和社区应对风险的韧性<sup>[28]</sup>。

具体策略包括:(1) 完善议事平台,拓展参与渠道。如建立议事委员、联席会议等制度,完善基层协商议事平台;开展参与式设计工作坊、公共活动日等参与活动,发现和整合在地的资源、需求和潜力;组建社区规划师团队,协助社区研提共同愿景并推动实施;(2) 开展社区赋能,提升参与能力。如组织议事和提案方法培训,促进协商技能;开展设计工作坊、微公益创投活动,提升居民参与设计和自组织的能力;培育社区学堂和社区组织,增进邻里联系和互助网络;(3) 引入外部资源,提供专业支持。针对大量社区“粘定型”社会资本强而“桥梁



型”社会资本弱的局限,搭建平台推动内外部合作。如引入高校团队和专业社会组织,助力社区发展;借助社区规划师团队带动在地团队培育,将地方经验、智慧与技术专长相结合,探索根植于地方资产和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GANAPATI S.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ree idea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 Research*, 2008, 27(4): 382-399.
- [2] GRANT J. *Planning the good community: new urba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3] 刘佳燕,王天夫,等. 社区规划的社会实践——参与式城市更新及社区再造[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LIU Jiayan, WANG Tianfu, et al. *Social practice of community planning: participatory urban regeneration and community rebuilding*[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9.
- [4] SMITH N R, ABRAMSON D, MI S. An introduction to planning China's communitie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J].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019, 41(3): 247-267.
- [5] MACQUEEN K M, MCLELLAN E, METZGER D S, et al. What is community? An evidence-based definition for participatory public health[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1, 91(12): 1929-1938.
- [6] BRAY D.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M].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7] LU D. *Remaking Chinese urban form: modernity, scarcity and space, 1949—2005*[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8] ROWE P G, FORSYTH A, KAN H Y. *China's urban communities: concepts, contexts, and well-being*[M]. Boston, MA: Birkhauser, 2016.
- [9]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 [10]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11] PARSAAE M, PARVA M, KARIMI B. Space and place concepts analysis based on semiology approach in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J]. *HBRC Journal*, 2015, 11(3): 368-383.
- [12] MAIN K, SANDOVAL G F. Placemaking in a translocal receiving community: the relevance of place to identity and agency[J]. *Urban Studies*, 2015, 52(1): 71-86.
- [13] C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 [14] KYLE G, CHICK 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sense of place[J]. *Leisure Sciences*, 2007, 29(3): 209-225.
- [15] SCANNELL L, GIFFORD R.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0.
- [16] 李九全,张中华,王兴中. 场所理论应用于社区研究的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 2007, 22(6): 85-90.  
LI Jiuquan, ZHANG Zhonghua, WANG Xingzhong. The application of place theory to community[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7, 22(6): 85-90.
- [17] FANG M L, WOOLRYCH R, SIXSMITH J. Placemaking with older persons: establishing sense-of-place through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mapping workshop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6, 168: 223-229.
- [18] CANTER D. Understanding, assessing and acting in places: i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possible?[M]// GARLING T, EVANS G W. *Environment, cognition and ac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9] VEENHOVEN R, EHRHARDT J. The cross-national pattern of happiness: test of predictions implied in three theories of happines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5, 34(1): 33-68.
- [20]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What is placemaking?[EB/OL]. (2007) [2021-07-20]. <http://www.pps.org/article/what-is-placemaking>.
- [21] CUMMINS S, CURTIS C, DIEZ-ROUX A V, et al. Understanding and representing 'place' in health research: a relational approach[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7, 65(9): 1825-1838.
- [22] THEODORI G L.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resource-based areas: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rooted in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05, 18(7): 661-669.
- [23] FLINT C G, LULOFF A E, THEODORI G L. Extendi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interaction to explore regional community fields[J]. *Journal of Rural Social Sciences*, 2010, 25(1): 22-36.
- [24] UN-Habitat. *Global public space toolkit: from global principles to local policies and practice*[R/OL]. (2015) [2021-07-20].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6/guia\\_global\\_ep.pdf](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6/guia_global_ep.pdf).
- [25] SCHLEBUSCH S.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evaluating place-making approaches[J].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2015, 4(4-1): 59-72.
- [26] 刘佳燕,邓翔宇. 基于社会—空间生产的社区规划——新清河实验探索[J]. *城市规划*, 2016(11): 9-14.  
LIU Jiayan, DENG Xiangyu. *Community planning based on socio-spatial production: explorations in "New Qinghe Experiment"*[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11): 9-14.
- [27] 刘佳燕,谈小燕,程情仪. 转型背景下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实践和思考——以北京市清河街道Y社区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2): 23-28.  
LIU Jiayan, TAN Xiaoyan, CHENG Qingyi.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Y community, Qinghe District in Beijing*[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2): 23-28.
- [28] YEBOAH D A. A framework for place based health planning[J]. *Australian Health Review*, 2005, 29(1): 30-36.